

韩战：中共外交领域里的“大跃进”式灾难

芦笛

一、引言

朝鲜战争是中共执政史上一个颇为独特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半世纪后的今天，用真正的民族主义眼光来看，它完全是中共外交领域里的重大灾难，由此为国家民族造成的重大灾难性后果并不亚于内政中的“大跃进”。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哪怕是再死硬的摩登红卫兵，也不敢为毛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辩护，但韩战却作为最浓重的一笔油彩，大概永远不会从中共这个“民族英雄”的脸上洗掉。不但爱党人士将永远把这看成是毛领导的中共的光辉业绩，就连对中共内政持严厉批判态度的许多所谓“自由知识分子”，也都将此作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扬眉吐气的辉煌时刻。记得聂华苓曾说，海外华人赢得白人的尊重的转折点就是韩战。在此之前，中国人只有让人看不起的份。哪怕是我这老反革命，都还常在阅读共军入韩早期取得大捷的史实时难以压下强烈的自豪感。

这其实说起来是民族的悲剧：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列强眼中一直是毫无好转迹象的东亚病夫，对外作战多是以耻辱告终。一系列屈辱，让我们变成了一个心理素质极度脆弱的民族，有着超常的自我肯定的心理需要。咱们是太需要外战的光辉胜利来为自己打气了。因此，中共介入韩战并一度获得大胜，最终和联合国军打成平手，激起国人自豪感是非常自然的，这其实也是我党赢得老一辈知识分子们拥护认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也就是在此暴露了中国人作为一个现代民族的致命缺陷：时至今日，咱们基本还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值得自豪的民族成就，只知道寻求感官的肤浅满足，不知道评价一位国务家时，不是看他是否敢于和强国翻脸，而是看他是否尽一切努力最大限度地捍卫了国家利益，也不知道 battle（战役）和 war（战争）的区别，因而不 知道中国或许赢得了朝鲜战争这个战役，却在整个外交战线上全军尽墨。

为让大众明白这点，我曾反复将斯大林和毛泽东作过比较。斯大林虽然是个历史上罕见的屠民暴君，但从苏联的国家利益上来看，他不愧为出色的民族主义国务家，处处为国家利益着想，千方百计避免和强国决斗，极度谨慎，从不把国家无必要地带到危险边缘。苏联对外作战，从来是欺软怕硬，专拣软柿子捏，先后对中国外蒙、波兰（内战时期）、中国东北、新疆、芬兰、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波兰（二战初期）用武，与此同时却千方百计避免和德国、日本等强国决战，只是迫不得已时才和日本打了旨在求和的诺门坎战役，直到二战快结束时才参加合力痛打日本那死老虎，为此使苏联版图扩大到了空前的地步。

哪怕就 是在韩战一事上也充分显示了他的传统作派。韩战本是他秉承沙皇传统扩大帝国势力范围的努力。当这种努力遭到挫败后，他立刻就成功地把中国拉下

水做替死鬼， 替他去打代理战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和北韩都是民族主义者，只有中国纯粹是为了宗教信仰毫不犹豫地牺牲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利益。

因此，用真正的民族主义眼光来考量，根据我作出的“卖国就是向外国出让放弃国家利益，包括民族尊严、国家主权、领土、资源、国民财富等一切全民财产，以及毫无必要地为外国牺牲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福利的行为”的定义，韩战不是什么“民族光荣”，而应被视为大规模的卖国行为。这就是我为何把它开列在毛犯下的九项 卖国大罪中。

我也知道，要让大众普遍认识到这一点，或许在我有生之年是没有希望了。如果有一天国人普遍明白了我这个系列讲述的简单道理，那么，中华民族或许就可以算是成熟了罢。

二、韩战爆发前中国面临的外交选择

我已经讲过多次，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吓坏了以美国为首的文明世界。美国和西方盟国围堵布尔什特主义在全球的扩张，与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了敌对的两 大阵营。南斯拉夫因为民族利益和苏联发生争吵，立刻就被美国视为宝贝，予以大量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其庞大的块头和在东亚的重要战略位置，本身 就决定了它在冷战中是可居奇货，具有其他共党国家无从取代的收买拉拢价值。

这一点最能在毛访问苏联中看出来。斯大林原来只想维持和国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根本不想另订新约，顶多只愿意从旅顺撤军。为此把毛晾在别墅里不理睬，形成了中国无力 打破的外交僵局。恰在此时英国宣布准备和中国建交，艾奇逊又在演说中造谣说苏联吞并了中国三北地区，立刻就让斯大林改变了态度，同意让周恩来前去谈判签约。

因此，哪怕毛什么都不用作，效法中央帝国的传统君主们稳坐中南海，也一定会有人上门来争相拉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难得的历史机遇，以后是再没这种好事了。如果把握这宝贵机遇，哪怕是庸主也能在美苏争斗中坐获无穷渔利。

不幸的是因为南斯拉夫事件，斯大林对毛满腹狐疑，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是马列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这恰好打在毛那个“庶出”的疼处。为了证明他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斯大林忠实的学生和信徒，毛便在建国前夕毅然宣布“一边倒”，接着又迫不及待地跑到莫斯科去和苏联结成盟国。在苏联期间，他为了向斯大林 表白对世界革命的赤胆忠心，不但下令征用美国兵营，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以此挤走美国所有在华领馆，而且特地向此事通报苏方，说明他的目的 就是要驱逐美国领事代表，并在与斯大林会谈时表明他

要“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

即使如此，事情并非就此不可挽回。客观局面明摆在那里：中国和美国没有什么战略利益冲突，更无领土纠纷，中美建交是必然的事，唯一剩下来的历史纠葛就是台湾问题，但就连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抛弃台湾并向世界明确无误地宣布了这一点。

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机构是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前者常为鸽派，后者常为鹰派，最终拍板定调的则是总统，这传统一直沿袭到今天。例如在侵伊战争中，鲍威尔和拉姆费尔德的态度就明显不同，而小布什基本是在后者的影响之下。

“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也是这个样子，5毛大楼主张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防止台湾落在中共手里，而国务院则倾向抛弃台湾，杜鲁门总统则同意国务院的意见。这期间最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乃是国务卿艾奇逊，他为美国制定的对华政策，今日读来倍感英明睿智。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一部中国的近现代史乃是民族意识在中国的觉醒史，而艾奇逊乃是看到了这个历史过程的少数外国政治家。

1949年12月29日，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官员就台湾问题进行政策辩论。参谋长联席会议此前曾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备忘录，认为协助国府防卫台湾符合美国安全利益，建议立即派人去调查保住台湾所需要的军事援助的性质和程度。

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他认为即使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援助国府，也守不住台湾，反倒会激起中国人民的仇恨，而且台湾对美国安全防护并无战略意义。最重要的还是，他指出，中国不受苏联支配是美国在华的一项重要资产，美国不应代替苏联变成威胁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把苏联当做唯一的伟大盟友。但是，他强调指出：“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从6年到12年而不要从6个月到12个月来看问题。”

这政策主张得到了杜鲁门的赞同，1949年12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美国在亚洲的地位”文件，制定了美国对华战略原则，那就是使用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去利用中共和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分子之间的分歧，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因为台湾并未重要到足以为之采取军事行动，因此，美国应尽一切努力以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总体地位。

本着这一原则，杜鲁门总统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对台湾问题的声明。保证遵守《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说美国和其它盟国尊重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已有4年了，并明确保证：

“美国对台湾和其他任何中国领土没有掠夺性意向。美国目前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和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无意使用武装力量干预现在局势。美国政府将不遵循足以使之卷入中国内争的方针。同样地，美国将不对在台湾的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上的意见。”

基于同一原则，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苏关系的实质：

“俄国人对华北和其他这些地区的态度和兴趣早在共产主义化以前就是如此的。这决不是共产主义的结果，俄国早已有此打算。但是共产主义制度为俄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增加了新的方法，新的技巧和新的概念。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和技术使俄国帝国主义装备了一种新的和很阴险的武器——这就是渗入。装备了这些新的武器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苏联正在把中国的北部省分从中国分离出去，使它们附属于苏联。这种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在满州已接近完成。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内蒙古和新疆的苏联代理人已向莫斯科提出了乐观的报告。这就是正在发生的情况，整个整个中国人居住的地区正从中国分离出去而附属于苏联。”

关于苏联吞并中国三北地区当然是造谣，但斯大林乃是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新沙皇则一点都不错。而且，从客观效果来说，老艾造的谣威慑了苏联的领土野心，不但吓得斯大林赶快下令让中苏两国外长同时发声明辟谣，因毛未忠实执行命令而批评了毛，而且使得他软化了原来的强硬态度，在和周恩来谈判时作了重大让步，使中国得以争回了部分丧失权益。因此，它其实是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如果毛是个称职的国家领袖，就该从此事中得到启发，“以夷制夷”，巧妙地利用美国来增强中国在对苏外交中的地位。

艾奇逊还指出：

“如果人们说我们的利益仅在于阻止共产主义蔓延那是比任何其他说法都会造成更多的损害，并在远东引起更多的曲解的。我们真正的利益是在于这些人民本身。我们所以要阻止共产主义是由于共产主义敌视这个利益。但恰巧这个双管齐下的最好办法，是在于去做正是亚洲各国人民所愿做的，也是我们愿帮助他们做的，就是：发展这些国家新政府的健全的行政，开发他们的资源和发展他们的技术的技巧，以使他们不致因愚昧无知，或因他们相信这些假的诺言，或因他们的地区有真正的灾祸，而受到侵入。倘若我们能帮助这个发展，倘若我们能和它一起前进，那末，我们就得到了任何人所知道的关于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最好办法。”

这是何等的真知灼见！这儿的意思是说，美国之所以要阻止共产主义蔓延，根本原因是共产主义敌视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利益。所以，完成这个使命的最好办法，还是让那些受害国家人民自己认识到这一点。正如我在前文中反复指出的，因为奉行国际主义（＝苏联的民族主义），否认民族主义，国际共运对苏联之外所有其他国家的国家利益都造成了巨大损害，唯一受益的只有苏联一国。

他最后警告那些主张武力支持台独的右派：

“我恳请所有正在考虑这种愚蠢冒险的人要记住：我们决不可夺取俄国人为自己安排下的这个不值得羡慕的地位。我们不可把中国人民对俄国人的正义愤怒和憎恨——它们一定会发展的——招引到我们自己头上来，这样做是愚蠢的。”

“我们必须采取我们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任何破坏中国完整的人都是中国的敌人，也是违反我们自己的利益的。今天下午我愿向你们提出这个看法，我认为这一点是美国制订对亚洲政策中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规则。”

这个演说犯了个致命错误，就是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把日本划作第一线，未将台湾和南韩包括在内。放弃台湾已经是美国政府的既定方针，但南韩却是美国绝不会放弃的防线，艾奇逊本人就力主放弃台湾坚守南韩，奇怪的是他居然会忽略了这一点，由此导致了斯大林的误读。这里按下不表。

以上这一系列政策声明，都是在毛访问苏联期间中作出的。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不难从中读出以下明确信息：

1、美国已经决定抛弃台湾，公开承认了中共对台湾的主权，等于放手让中共去“解放”台湾。中美之间既无影响邦交的国家利益冲突，又从此去除了历史原因形成的改善双边关系障碍。

2、美国看出了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迟早要引起中国的民族主义反弹，决定避免扮演传统帝国主义列强的角色，干预中国内政，伤害中国主权，而是让苏联去干这种背时事。

3、美国寄大的希望于中苏破裂，以形成反苏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流露出来的最微不足道的善意姿态，都会让华盛顿欣喜若狂。哪怕不投木瓜，人家也会报以琼瑶。

正因为此，尽管美国国内政治浊流翻卷，麦卡锡（徐水良的前身？）主义甚嚣尘上，而且毛还刻意配合美国右派，采取了一系列旨在触怒美国的措施，诸如没收美国旧兵营和其他财产、驱赶美国使馆人员等等，在国会山引起了右派风暴，但民主党政府还是把住了舵轮，坚持了既定方针，目睹蒋溺而拒绝援之以手。

1950年4月30日，共军攻陷海南岛。5月18日，共军攻陷舟山群岛。至此，共军已在华南各地修建军用机场30个，400架战斗机已进入战斗状态；在福州、厦门、汕头等港口，大量登陆艇及船只已进入起航准备。台湾危如累卵，而美国国务院则处变不惊，准备按原计划撤离台湾。

1950年5月17日美国驻国府临时代办斯特朗从台北报告说：“我和使馆的人员都认为，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共产党可能在6月15日至7月底之间发动进攻”，建议开始撤侨并准备撤馆。5月26日，国务院回电批准其建议，令其尽早采取有关措施，准备撤离。

老美撒手，老蒋也就失去了最后的希望。5月27日，台湾《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承认台湾“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蒋介石立志和宝岛共存亡，已对手下将领明言：“如果台湾不保，我是决意不会走的。”据蒋经国回忆，当时蒋介石已下定“杀身成仁”的决心，并勉励其将领“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候，选择最有意义的死。”

这不是危言耸听，据我党后来披露，当时确已万事俱备，只待7月间台湾海峡气象条件合适时，千军万马就要跨过海洋。大军过海，国府作鸟兽散，死的死，亡的亡，从此“漫江碧透，层林尽染”，中国再无尺寸净土留下来。就算毛泽东立志以开罪美国显示他的革命坚定性，老美也找不到一个反对政权去扶持，更没有理由让国府继续作安理会常理国，把中国关在联合国门外。中美迟早要建交，而远东的历史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但上天注定了老蒋将获善终，6月25日，北韩军队在3000多名苏联顾问指挥下，大举越过三八线向南进犯。一夜之间，整个远东的外交格局就此改铸。

三、毛泽东本可制止韩战发生

随着苏联档案解密，韩战爆发的过程如今已大白于天下，那是苏联和北韩联合策划的侵略战争。

前文已经指出，苏联在二战末期趁火打劫，对日宣战，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向中国东北和朝鲜扩张一直是老沙皇的迷梦，这一扩张野心因日俄战争爆发而暂时受挫，然而40年后，新沙皇又卷土重来，趁加入对日作战之机，席卷了中国东北以及北韩。斯大林从退入苏联的抗联残部中，挑选了金日成作为北韩领袖，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原来不过是暂时划分苏美占领区的北纬38度线变成了南北韩两国的国界。

当国时，金日成不过是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愤青。无论是论能力、经验还是资格都完全不配作什么国家领袖，真不知道斯大林为何会挑上这样一个废物。该同志是个野心勃勃的爱国者，立志征服南方，成为朝鲜历史上第一个在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建立统一独立国家的君主。

很明显，由于朝鲜问题已经国际化，靠北韩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实现这一个人雄心。出于历史原因，金日成虽然在中国长大，却因中国过去多次入侵朝鲜并长期充任宗主国而对中国深怀戒心甚至敌意，立志要和朝鲜的“事大主义”传统决裂，这大概就是他那全世界人民都在刻苦学习的“主体思想”吧。由于日本先下手为强，俄国还没有来得及成为朝鲜的世仇。与中日相比，苏联当然是金日成的第一选择，更何况他完全是苏联红军捧上宝座的。

其时南韩政局乱得一塌糊涂，而共党别的长处没有，以铁腕镇压人民谋求安定团结则是专业特长。金日成目睹南方骚乱，自觉统一时期已经成熟，这一雄心在

旁观中共 席卷中国大陆时就更加急切了。但全世界共产党都得受莫斯科领导，不能擅自行动，于是他便多次向斯大林提出请求，要求武力统一朝鲜。

斯 大林欺负吞并弱国从来大刀阔斧、勇往直前，但与强国打交道则堪称“诸葛一生唯谨慎”。他深知国力不是美国对手，从来是小心翼翼地量力而行，其行事原则从来 是在安全范围内作最大限度扩张，一旦达到美国忍耐极限，有正面冲突危险时便适度退缩，有时甚至忍辱负重，第一次柏林危机就是如此。

正 因此，他一直不同意金日成的请求，生怕引起和美国的正面冲突。直到毛访问苏联前夕，斯大林还与毛泽东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 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不同意。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不应在朝鲜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在毛与他会谈时并 未提及朝鲜问题。因此，毛的印象还是原来那个，亦即斯大林不赞成武力统一朝鲜。

毛不知道，还在他 访苏期间，斯大林便已改了主意，同意了金日成的冒险计划。1950年1月底，毛还在莫斯科，斯大林就私下通知金日成，同意他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 问题，随即批准金日成的扩军备战计划，向朝鲜派出总军事顾问，并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据后来叛逃到苏联去的北韩高官披露。为了瞒过中国，苏联的军援不走中东 铁路（即满洲里—绥芬河线）的近路，却由海路运输。

斯大林为何会在毛访苏期间改变主意，同意金日 成去冒险？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那是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演说惹的祸。前文已经介绍过，该演说把美国的“环行防御带”划到 日本菲律宾等国，却遗漏了台湾和南韩。前文也介绍过，该演说引起了斯大林高度重视，为此还下令让两国外长发表声明辟谣，说明苏联并未如艾奇逊所说的那样， 吞并了中国的三北地区。

不难想见，这一重大疏忽绝不会逃过斯大林的眼睛。美国放弃台湾已经是既定 政策，对此中苏都应该心头雪亮，否则中共根本不会大张旗鼓地准备“解放”台湾。现在艾奇逊既然间接宣布南韩也不在美国的防御圈中，那当然意味着美国已经决定抛弃南韩。毕竟，当初中共席卷南中国时老美都没有干涉，很难想像他们现在会为了个贫瘠的朝鲜半岛大打出手。这正符合斯大林“在安全范围内作最大限度 扩张”的边缘政策，所以他才会不早不迟，恰在毛访苏之际突然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批准了金日成的请战书。

有 了大老板点头，金日成便疯狂地扩军备战。彭德怀入朝后不胜惊骇地向中央报告，朝鲜领导人极其“幼稚”，完全是竭泽而渔。该国18岁到45岁的男子统统被抓 壮丁，政府丝毫不管家属在丁壮离家后如何谋生，听其自生自灭，导致大量壮丁拒绝服兵役而集体逃亡，而金日成则派兵去围剿，还要求志愿军也这么干。这事竟然 成了引起双方摩擦的一个问题。

1950年4月间，金日成访问苏联，向斯大林汇报武力统一计划，斯大林表示同意，随即指出，关于此事朝鲜同志应更多地和毛泽东同志商量，因为毛泽东同志对东方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那意思就是动手无妨，但应取得中国同意。

前文已经介绍过，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刘少奇曾秘密访问苏联，为毛访苏打前站。斯大林曾御封了中共作“二头领”，规定中共此后担任国际共运的亚洲领导，亚洲共党都得向中国早请示晚汇报。因此，他要金日成取得毛泽东同意再动手乃是顺理成章的。

斯大林为何一边怀疑毛是铁托，一边又要如此抬举中共？我的理解是，这完全是战略大师之举，一石数鸟。

首先，此举必然安抚了中共，满足了毛泽东的虚荣心；其次，它用权力和责任将中共捆在了苏联阵营里；第三，它把中共推到了和美国对抗的第一线，而莫斯科则可躲在后面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减轻了和美国正面对抗的风险。第四，中共扮演这种角色必然引起和美国的对抗，由此形成的“反作用力”必然将中国推入苏联怀抱，增加中国对苏联的依赖，降低了中国的离心力。第五，有二头领在亚洲打头阵和美国捣乱，必然会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向亚洲，而欧洲正是当时苏联和美国争夺的主战场，冲突焦点就在柏林。

这就是为何斯大林要力排众议，支持中共提出的亚洲革命总路线。1949年底，刘少奇在亚洲工联理事会上的报告提出，亚洲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取得自身解放的唯一道路必须是坚持暴力革命。各国应当学习中国经验，建立人民解放军，展开夺权斗争。很明显，中共在亚洲按自己的模式输出革命，势必把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引过来，而他只需袖手旁观就行。

据此也可圆满解释他为何在背着中国和金日成秘密策划了侵略战争之后，却又要金日成去取得毛的批准。此中涵义便再笨的人也看得出来，无非是把中国拉下水。毛不同意则已，一旦同意，无论成败，这责任都跑不掉了。此乃抚远大将军韦小宝传授给罗刹公主苏菲娅的“投名状”之计，在该国讹传为“丢命上”，写在《罗曼诺夫兵法》中，被斯大林后来学了去，其俄文名词尚待跛脚僧那懂71国文字的老同志向大家介绍。

当然斯大林要比罗刹前辈高明得多。他是瞒着中国先批准了战争计划，再让金日成去请示毛泽东，完全是先造成既成事实再强加于人。大老板都已点头，二头领还能有什么话说？

于是金日成便在5月13日秘密访问北京，和毛会谈。当他告诉毛准备发动战争，而且斯大林已经同意这一计划时，毛极感意外，立即中断会谈，令周恩来前去找苏联大使罗申，向斯大林证实此事，并立即召集在京主要领导人会商。次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来专电，证实了金日成的口信，说他虽然同意，但已告诉朝鲜同志必须征得中国同意。于是球便被那老奸巨猾的老狐狸打到了毛的手上。

毛此时处境极为尴尬：作为毫无国家民族观念的共产党人，他的视野里根本没有国家利益，更不能以此作理由否定金的请战书。从共同的宗教信仰出发，他不能否定朝鲜人民的武装战争，那恰好符合刘少奇在半年前宣布的亚洲共运总路线。

但他心头之不快也是不用说的：金日成的冒险必然要激化远东紧张局势，给他部署就绪的“解放”台湾之役带来巨大冲击，他不至于看不出这点来。此前他已经和斯大林达成共识，不同意在现阶段武力统一朝鲜，而斯大林却食言而肥，瞒着他这亚洲领导，去和他的部下达成协议，临到万事俱备才来请他作背书。毛就是再蠢，也不至于看不出被总领导玩了。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他是狂热的共产教徒，只要“斗国批修”不彻底，还残存着私心杂念，仍然可以避开意识形态雷区，否决小金的申请。他可以想出一百条理由来，例如朝鲜分裂是国际协议造成的，单方面改变现状可能为美帝侵略提供借口，而朝鲜半岛的地理条件有利于美帝发挥两栖作战的特长，包抄人民军的后路，给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带来沉重打击。毛这点战略眼光还是有的，战事爆发后一个多月，他就看出了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警告了北韩和苏联，可惜双方都没理睬。

在这次会谈中，毛确实警告了小金这一危险，说一旦有二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金日成对此毫不在意，说斯大林已经告诉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都“几乎不可能”参战。即使美国人派两三万日本军队来，也不能改变战局，而人民军将会更加猛烈地作战。但毛泽东还是指出，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让毛的热脸贴了冷屁股。

毛蠢到看不出来，朝鲜从来把中国当成大敌，中共建国后，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以致中国连个能让对方信任的大使都迟迟派不出去，岂还会同意中国陈兵边境，让中国人趁人民军在南方鏖战之际端了后方老窝？此前金日成倒确实向中国要了三个师，但那些部队都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族官兵，回去后被他用作前线主力，并没有什么危险。

类似地，毛还热心地给了小金若干极其有用的战略指导。他根本不知道，小金虽然过去是他的部下，不过乃是抗联那杂牌部队的，属周保中旗下，长期在苏联生活，只知崇拜苏联，根本不知道我党打仗的本事。他眼中的世界西起波罗的海，东至白令海峡，根本就不包括中国在内。在他看来，有了苏联顾问的指导，又装备了苏军最精良的武器，岂有不胜之理？他乃下烂游击队低级军官出身，谈何战略眼光？唯一特长就是高度发达的肾上腺以及满腔热血。发高烧说胡话乃是职业专长，在和毛的会谈中，他认定一个月就能“解放”全朝鲜，这还是伟大谦虚了，过去他在和苏联人会谈中，连三天解决问题的胡话都曾说过。

可怜毛那百战之主，竟然落魄到和那种低档愤青共事，还成了个被褐怀玉，卖不出和氏璧的卞和！他不知道金根本就不是来向他请教和求援的，是让斯大林逼着来完成审批手续的。如果不是斯大林要他这么做，则他根本也就不会让中国与闻此事。所以后来韩战爆发，毛竟然是从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事后三天，金日成才派一名校官到北京通报情况。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事后对师哲说：“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哪怕就是不以美国参战为借口，毛也可以坚持按过去共党阵营中达成的共识办事，先解决台湾问题再解决朝鲜问题，要求金日成等到台湾攻下来再说。的确，他在会谈中也委婉表示了这个意思，说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中国解决了台湾问题后，就能更有效地援助朝鲜。但他立刻就接着说，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

于是，毛就这样愚蠢无比地放弃使用亚洲共运领导人的否决权，在斯大林造成的既成事实前屈服了，同意小金那废物去冒险。毛竟然牺牲“解放”台湾的私利去助人为乐，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急于在斯大林面前显示他的革命坚定性，证明他不是铁托那样的民族主义者，而是具有大公无国的高度觉悟的国际主义战士。

毛不知道，斯大林天性狐疑，根本就不会长久为你的效忠感动。与其指望人家爱上你，莫如让人家需要你，而保持决策的独立性，拉开和苏联的距离，适当接近美国，正是让斯大林器重中国的唯一正确途径。哪怕撇开国家利益不谈，光考虑提升毛和中共在苏联阵营中的地位，这也是上策。就连传统社会的官军将领都知道“养寇自重”，毛这个只读旧书的人何以不知？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下，美帝不就是苏联阵营眼中的寇么？为何不知挟寇自重，让“成吉思汗”（这是毛后来对斯大林的评价，准确之极，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就是类似蒙古的一个大帝国）知道不能轻易得罪或牺牲中国汗？

因此，哪怕是从毛的私利角度看，他也完全可以动用斯大林给他的否决权，以“左倾冒险主义”之类的罪名否定金的计划。最起码他可以说：我不同意，请你们再去请示大老板。如果最后大老板最后还是决定同意，那我在服从上级决定的同时保留个人意见。没有他的支持，斯大林很可能就不敢动手，后来的灾难也就免掉了。那样顶多也就只会得罪本来关系就很紧张的无足轻重的小喽罗北韩。大老板就算不快一时，总不至于因此和中国破脸。就算斯大林最后还是决定打，那也解脱了毛的责任，中国也就没有任何道德义务出兵替人洗屁股。即使出兵，那就成了恩赐，对方也就会份外感激。

然而这一切毛都没做，明知此事要冲击他的“解放台湾”的既定计划，却去助人为乐，热衷于以火热的满月脸去贴儿辈废物那冰冷的胖屁股，当真是生贱了。无论是从国家利益，从党的利益，还是从他的私利而言，此举都只能视为惊天动地的白痴行为。对这一客观功利判断，想来就是爱党同志也无法否认吧？